第 52 卷 第 1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2, No. 1
2015 年 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an. 2015

试论清代列女的文学世界
——以《清史稿·列女传》为论

彭 国 忠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　要: 列女的文学创作,从有《列女传》起便已存在。清代有文学创作的列女人数,是后汉到明代全部总和的二倍,达到六十余人,其中,有诗文别集者即达三十五家,这是清代列女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志。清代列女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大的价值功能,是它承载了丰富的德性内涵。而绝命诗辞的创作,体现出列女的临终文学关怀。经史艺术、自然科学、文学批评等综合素养的提高,是清代列女文学繁荣的内在原因。清代列女的文学创作得到清代评论家的关注,《清史稿·列女传》往往也直接称赞评论列女的文学成就。

关键词: 列女的文学世界;《清史稿·列女传》;诗文别集;德性内涵;绝命诗辞;综合素养

中图分类号:I 20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1-0106-10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列女当作道德的典范,而忽略大量列女进行过文学创作的事实,致使列女的文学世界成为无人问津的冷清领域。中国列女的文学创作,很早就开始了,从《后汉书》至《清史稿》,历代史书中为列女置传者,多有关于列女文学创作的记载(仅《金史》例外),然最多一代不过数人,自后汉至明代,有文学创作的列女共三十一人(重复者不计),而《清史稿·列女传》所载有文学创作的列女则多达六十二人,为前此人数总和之二倍,可见清代列女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这与《清史稿》中列女人数基数多,清代从事文学创作的列女人数相对增多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是,从女性自身的发展趋势、女性文学的历代累积看,清代列女文学创作的繁荣,又是势所必然。考察清代列女的文学创作,深入到她们的文学世界中去,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独特的群体,进一步研究清代女性文学,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诗文别集的坌涌:列女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志

清代列女文学创作繁荣的首要标志,是诗文别集的大量涌现。《清史稿·列女传》六十二位文学列女中,有诗文别集的列女多达三十五家,超过一半以上。今从三类论之。

一、载录有别集(含未全著录),且有刊本传世者十九家

张英女令仪,有《蠹窗集》①,其中《蠹窗诗集》,雍正二年(1724)刊本、乾隆二年(1739)刊本,俱十四卷;道光间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本作一卷,当是选本;《蠹窗诗馀》一卷,见《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另有《蠹窗二集》六卷,乾隆二年刊本;《锦囊冰鉴》二卷、《乾坤圈》、《梦觉关》,《桐城县志》著录而未见刊本。

顾若璞"为诗、古文辞","题曰《卧月轩稿》"(14049),有顺治八年(1651)刊本《卧月轩集》六卷。

收稿日期:2014-08-27

作者简介:彭国忠,男,安徽霍邱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ZW031。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女传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46 册,第 14022 页。下文引文出自该书者,仅随文标页码,不具注。

蔡琬“能诗,有《蕴真轩诗钞》”(14050)。《蕴真轩诗钞》,《清史稿·艺文志》(下文省称《艺文志》)作《蕴真轩小草》二卷,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写刻本。

高景芳“有《红雪轩诗》”(14050),《柳絮集》载录为《红雪轩诗文集》六卷。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精刊本。

徐灿“有《拙政园诗词集》”(14050),《艺文志》则著录《拙政园诗集》二卷、《拙政园诗馀》三卷。皆入嘉庆八年(1803)吴氏《拜经楼丛经》。《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亦收录其词三卷。

王贞仪有“《德风亭集》二十卷”(14051),民国初年蒋国榜《金陵丛书》收录《德风亭初集》十三卷,含文九卷,诗三卷,词一卷。《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收《德风亭词》一卷。

李长霞“工诗,有《锜斋诗集》”(14051),一卷。有民国赵琪辑《掖海丛书》本。

汪端“所自为诗,有《自然好学斋集》……既卒,诸侄重定其集,尽删晚作,二本并行于世”(14053)。汪端《自然好学斋集》,原本十卷,有冒俊《林下雅音集》本、同治间浙江书局本,名《自然好学斋诗钞》;经其诸侄删弃晚作的则为五卷本,有道光十九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名《自然好学斋诗》。《艺文志》著录五卷本,当为删本。另有《自然好学斋诗集》一卷,收入《国朝闺阁诗钞》。

赵棻“幼读书,能诗文,有《滤月轩诗集》四卷,《文集》二卷,《词》一卷”(14053)。《艺文志》则著录《滤月轩集》七卷,当为总名。该集有道光十年(1830)刊本、道光二十七年刊增补本、咸丰八年(1858)续刊本,列入《荔墙丛刻》。赵氏《南宋宫闺杂咏》一卷,有单行本,《武林掌故丛编》《香艳丛书》皆收录。

阳湖张氏诸女“咸有述作,皆能诗。緍英兼为词”(14054),《艺文志》著录緍英《澹蘜轩初稿》四卷《词》一卷;著录纶英《绿槐书屋诗》三卷;著录緍英《纬青遗稿》一卷;“纨英兼治古文”,《艺文志》著录其《餐枫馆文集》二卷,《邻云友月之居诗》四卷。四女诗文,曾合集为《阳湖张氏四女集》,有道光中阳湖张氏宛邻书屋刊本;緍英与绷英集,又被收入《酌古准今》,有道光光绪间刊本。《国朝闺阁诗钞》收緍英《澹蘜轩诗藁》一卷,《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收《澹蘜轩词》一卷。绷英《纬青遗稿》,另有《宛邻书屋丛书》本、《江阴丛书》本、《粟香室丛书》本;《纬青词》一卷,入《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汪嫈作品,其子“葆编其所作为《雅安书屋诗文集》”(14054),《名媛诗话》著录为《雅安书屋诗集》四卷,《文集》二卷。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本。

王韶,“著有《冬青馆诗》”(14055),《清闺秀艺文略》著录为《冬青馆集》。

钱孟钿“工诗词,即以‘浣青’名其集”(14057),《艺文志》著录其《浣青诗草》八卷。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写刻本。另有《浣青诗草》一卷,《国朝闺阁诗钞》本;《浣青词》一卷,《小檀栾汇刻闺秀词》本。

左锡璇“著有《卷葹阁诗集》”(14081)。台湾学者林玫仪《左锡璇诗词集辑校[一]》,据上海图书馆藏左氏诗文词,计得《碧梧红蕉馆偶存诗草》一卷、《碧梧红蕉馆吟草》稿本;《碧梧红蕉馆诗草》一卷,稿本;《碧梧红蕉吟馆诗草偶存》二卷、《碧梧红蕉吟馆诗馀偶存》一卷,稿本;《碧梧红蕉仙馆诗馀偶存》不分卷,石印本①,而独无《卷葹阁诗集》,是可补。又:《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七集录其《碧梧红蕉馆词》一卷。

曾懿“著有《古欢室诗集》”(14081),《华阳县志》著录为《古欢室诗词集》四卷,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刊本。光绪中刊《古欢室全集》,其中除《古欢室诗集》三卷外,尚有《浣月词》一卷,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刻本。

傅宛“工诗,著有《山青云白轩诗集》”(14081)。有民国十一年(1922)排印本。傅宛另有《然脂百一编》,民国四年排印本。

二、载录有别集而未见传本者六家

田绪宗妻、田雯母张氏,“有《茹荼集》”(14021),《撷芳集》著录作《茹荼吟》。张英妻

---

① 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21 页。

姚氏“有《含章阁诗》”(14022),《清闺秀艺文略》作《含章阁偶然草》。钱纶光妻陈书,“晚为诗,号复庵……诗三卷,戒(子)陈群毋付刻”(14024),这三卷诗,据《名媛诗话》著录,名《复庵吟稿》。蔡琬、珠亮妻、嵩山妻:“嘉庆间,铁保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以(蔡)琬为馀集首。同入选者,珠亮妻、嵩山妻皆宗室女”,“珠亮妻,有《养易斋诗》”(14050),《柳絮集》有《养易斋诗集》,署养易斋女史撰。“嵩山妻有《兰轩诗》”,《国朝闺秀正始集》著录为《兰轩遗集》。

三、有别集而未被载录者十家

恽冰有《题画诗稿》,《清闺秀艺文略》著录。恽珠“善为诗”(14026),其诗(词),《艺文志》著录为《红香馆诗词草》,有嘉庆十九年(1814)刊本、同治五年(1866)重刊本,民国十七年(1928)武进陶氏涉园影印嘉庆本。丁畹芬,“将死,书所为《思亲赋》及词六篇,字画端静如平时”(14036),《清闺秀艺文略》著录其诗文集为《静兰诗文稿》。袁枚妹袁机,有《素文女子遗稿》一卷。宋景卫,“同县陈氏女淑睿,未行而婿殇,有请婚者,遂自经。景卫为作诗……八百馀言……病女教不明,乃会通古训,括圣贤修身尽伦之要,复作诗九百馀言,授娣、侄,令歌习之”。(14094)《柳絮集》著录为《宋贞女诗》。姜桂,“能诗善画,尝为《柏舟图》,赋诗赠(宋)景卫”(14095),《清闺秀艺文略》著录为《姜贞女诗集》。吴宗爱,“所著诗二卷”(14119),《艺文志》著录为《绛雪诗钞》二卷。顾荃,“能诗画”(14121),其诗,《畿辅书征》著录为《芬若诗草》。王甥稠,“能诗”(14163),《江阴县续志》《江上诗钞》著录其有《茗韵轩遗诗》一卷。

《隋书·经籍志》有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据此可以认为:别集是作家“心灵”与独特创作风格的标志。三十五家列女诗文别集的涌现,说明一半以上有诗文创作的清代列女,形成了自家独具特色的文学风貌;而别集作为诗(词)文作品的集合体,显示出作品数量上的规模程度:这二者充分说明清代列女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反映出清代列女文学创作的高度繁荣。

列女之为列女:列女创作的德性内涵

列女留下的文字,形态多样,并非都可以称之为文学创作。如:朱棫之女“遗书告文甲曰:‘君家孝娥以身殉父,儿愚只知有母,深负舅姑慈,愿更得贤妇奉饔飧也’”(14035),乃普通遗书;李应宗聘妻李,“刺血书九十四字。民家女未尝读书,字多讹易,嘉兴钱仪吉为之句读。曰‘呈天子前’,曰‘忠孝节烈’,曰‘二月初九日’”(14097),更是不成文。列女的文学创作,除了前文所言著有诗文别集者外,就是写有诗歌或者其他成体文字,具一定可读性。这是一切称之为文学的必要条件,列女的创作也不例外。未留下诗文别集的列女,也有一些文学创作;而且,这些创作,更与其德行事迹直接相连,是她们进入《列女传》的直接原因,也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

列女创作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大的价值功能,是发扬传统伦理精神,承载先人文化血脉,保留民族文化重建的因子。阅读清代列女作品,我们除了认识到列女之为列女的德行之美,更可以感受到华夏文明的伦理辉光。孝道、夫妇之情,是列女作品最感人之处。耿恂女一圭,“恂举人,无子,客授保定。母刘病痺,一圭按摩抑搔,尝六七昼夜不少休。母少间,因卧床下,恂自外至,误践其手,指甲脱,血流至肘,倦不自知也。尝议婚某氏子,未聘而某氏子夭,女闻泣曰:‘我得终事父母矣!’遂矢不字。刘病垂二十年,哽噎不能食,食必女口哺。恂卒,持丧奉病母归里。逾年,刘亦卒,一圭营丧葬,自为文以表于阡。一圭尝以生日上冢,掬土以益墓,惫仆墓侧,家人掖以归,数日卒”。(14037)生时悴心尽力侍奉,卒后为文伤悼,耿一圭对病母不弃不离的感情,实乃出于至性本然,非后天教育所致。与耿一圭的孝于母不同,高其倬妻蔡琬则主要以诗歌记述反映其父战功:“琬谙政事,其倬章疏文檄每与商榷。能诗,有《蕴真轩诗钞》。集中《辰龙关》《关锁岭》《江西坡》《九峰寺》诸篇,追怀其父战绩,尤悲壮,为世传诵。”(14050)蔡琬以女儿身份为诗歌颂父功,且“为世传诵”,显然是孝的体现。阳湖张氏诸女,亦以

学、艺传其家："吴廷鉁妻张，廷鉁，常熟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张名綪英，字孟缇，阳湖人。世父惠言，父琦，皆博通能文章。綪英与诸女弟承其教，咸有述作，皆能诗……纶英尤工书，传琦笔法……纨英兼治古文。"（14054）《列女传》在记载张氏诸女文学事迹时，显然强调诸女"承父教"的一面。而顾若璞别集名《卧月轩稿》，则是夫妇之情的体现。据其自为集序，她"笄事东生十有三年。间事咏歌，大抵与东生相对忧苦之所为作也。东生溘逝，帷殡而哭，不如死之久矣。徒以藐诸孤在。发藏书，日夜披览，二子从外傅，入辄令隅坐，为陈说吾所明。日月渐多，闻见与积，圣贤经传，旁及《骚》《雅》词赋，冀以自发其哀思"，因为"轩为冬生所尝憩，志思也"（14049），则一部《卧月轩集》，可视为其夫妇忧苦相共，及夫死后她的哀思之情的载录。《诗大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伦理诗学观，在列女作品中得到集中而精深的阐释。

列女文学创作的另一内蕴，是采用自叙平生或自述家史、家事的方式，抒发深切厚郁的情感。蔡庚妻吴氏"尝为辞自序曰：'父母生我时，惟原得其所。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殁，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十八幸生男，朝夕姑欣睹。无端因痘殇，姑泣泪如雨。堂上节姑哀，入幔痛肝腑。二十再生男，视若擎天柱。儿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姑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儿，骨肉又归土。姑只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隐痛敛深闺，衰颜原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馀乃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我今补夫缺，一死何所顾？哀哀我父母，惸惸将泣诉！'"（14078、14079）诗歌从自己出生时说起，"十六""十八""二十"之类的时间叙事，是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叙事的典常模式，从《孔雀东南飞》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到大诗人李白《长干行》的"妾发初覆额""十四为君妇""十五始展眉""十六君远行"……，皆是如此。吴氏此诗，采用这种最具女性特色的叙事方式，在家庭事件的详细陈述中抒发悲怆情怀，言发由衷，催人泪下。王师课妻朱氏"明亡兵乱，朱率二子避九里坳，尝遇贼，胁以刃，朱夺刃剺面，哭且詈。贼欲杀之，二子号恸求代，得不死。事平，归老于家。尝为《勖子歌》五章，其三章曰：'我生之后逢世乱，白头兵起苍黄窜，肤血染点丛麻红，母子支离宵不旦。飞鼺雷聚惊鼓鼙，秋雨淋漓断薪爨。呜呼，九里坳边真瓦全，尔曹性命天所怜。'五章曰：'庭闱肃洁辞亲族，薄田聊许资饘粥。震荡扁舟波复风，儿才却聘家回禄。此身直缘正气生，机杼犹能活枵腹。呜呼，但原长作太平民，何尝俯仰惭天人。'"（14066）朱氏《勖子歌》实际亦为自叙，将家庭事件、个人遭遇与时代社会状况相结合，颇有汉末诗歌梗概。阚玉"端丽，能诗文。父亡，与母及兄嫂居。年十三，福王由崧帝南京，选民间女子，玉母匿诸卖菜佣家。玉父亡时，留百金畀玉兄备玉嫁，玉兄荡其赀，遂与佣谋字佣子。玉在佣家尚待年，号泣求还，不可得。疾作，始遣归。玉垂绝，语其母曰：'儿今且死，愿埋父棺侧，不作佣家鬼也。'复嚼齿曰：'兄陷我！'遂卒。""玉尝作《怨歌》，好事者以琴谱其声，曰《阚玉操》，辞曰：'父生我兮中道逝，母茕茕兮门衰瘁。兄嫂难与居，抉我如目中之尘沙。伊又遘此佻巧兮，胡迋我之实多。彼六礼之已愆兮，曾贞女之觊从。矧要予以桑中兮，夫岂其为予之匹双。我有母兮，癙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冲发。我兄摩挲佣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兮，笑言哑哑。我忽愤气兮，如云。指漆室女以为正兮，又告夫司命与湘君。予不爱一死兮，弗忍速阿母之下世。愿死而有凭兮，为凶之厉。呜呼哀哉，我终死兮，魂独归去。明告我母兮，幽告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纵谓行多露兮，宁能我之汙也。重曰：嘉名为玉，父之命兮。幽辱粪壤，终保贞兮。忧思悄悄，泪淫淫兮。蒙耻忍诟，日当心兮。'"（14103）阚玉的《怨歌》是骚体诗，历数父亡、母衰悴、兄强悍自肥、嫂睨笑、己孤单难为等种种情状，并反复以这些家庭成员为诉求对象，以自明心志，怒抉郁愤。

列女文学创作的另一旨意，是遵循儒家诗教遗则，以诗文言志，移风易俗，劝诫民众。"尹公弼妻李，博野人。公弼早卒，家贫，舅姑老，父母衰病，无子。养生送死，拮据黾勉。教子会一有法度，通籍，出为襄阳府知府，李就养。雨旸不时，必

躬自踞祷,禳疫驱蝗亦如之。冬寒,民六十以上,量予布帛。襄阳民德之,为建贤母堂。李赋诗辞之,不能止。会一移扬州府知府,扬州俗奢,李为作《女训》十二章,教以俭。累迁河南巡抚,所至节俸钱,畀高年布帛,赒贫民,佐军饷,皆以母命为之。民间辄为立生祠,如在襄阳时。会一内擢左副都御史,李以疾不能入京师,陈情归养。复以母命,里塾社仓次第设置。居数年,高宗赐诗嘉许,榜所居堂曰'荻训松龄'。"(14023)李氏教子爱民,赋诗自明心志,以推辞襄阳民为其建贤母祠;又著《女训》十二章,劝诫扬州奢侈之陋俗。李氏诗歌,《柳絮集》卷三十六题作《会儿守襄阳时能奉予训得士民心襄人为建贤母堂作诗谢之》,二首,后者云:"堤名寡妇留江上,城号夫人在眼前。只有婆心方寸许,何劳士女竞流传。"①诗歌认为自己的功绩,无法同襄阳的寡妇堤、韩夫人助修城墙相比,而辞谢士民修堂。李闺"明季,字淮王世子由桂。入国初,由桂出亡,闺誓不更字,尝咏金环曰:'红炉经百炼,不失本来真。'事父母孝,年五十九卒"。(14065)金环乃常伴女性的一种物件,经过红炉的千锤百炼,不失其本真,李闺以金环象征自己的坚贞品质,抛开明清易代的政治因素不论,这种对个人操守的秉持,仍是值得肯定的。而著名列女诗人汪端,陈裴之妻,才华与德行并称:"七岁赋《春雪》诗,拟以谢道韫,因又字小韫,钱塘人。长为诗,旨远而辞文,尝撰定明诗初、二集……裴之卒,子又有疾,舅文述素奉道,端诗亦多为道家语。"(14052、14053)她在夫死子疾的恶劣情境下,既维持家庭、坚强自立,又坚持文学创作,以诗歌书写自己的生命意志。

绝命诗辞:列女的临终文学关怀

历史上,颇有不少女性将自己创作的文字秘不示人,甚至焚毁。列女也有临终焚弃文字者,如蔡贞仙:"取所读书、所为诗词尽焚之。钗于髻,钏于腕,旦起袭故衣,问安于姑所,辞色如常时。午侍食,既撤,入室缢"。(14158)而清代也有一些列女在临终之际,更关心自己的创作,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传世久远,如王贞仪:"病且死,谓枚曰:'君门祚薄,无可为者。我先君死,不为不幸。平生手稿,为我尽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14051)王贞仪临终前郑重托付丈夫将自己的手稿交付给另一列女蒯夫人,因为蒯夫人可以表彰她的文学业绩和声名。还有一些列女,在临终之际,特别是为保持自己的贞操、品节而结束生命时,从容、毅然选择诗、辞等文学形式,表达自己所承受的不公命运,表达自己的坚贞操守,以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充分说明她们对文学的信任,反映出她们的文学修养,文学成为她们的临终关怀。

临终之际选择以文字作别世界,是为绝命诗辞。绝命诗辞在前代也有,但前代列女题写绝命诗辞的不多。

清代列女绝命诗辞的创作,分三种情况。

一是遭遇战争兵祸,或者其他外力胁迫,守节而死,作绝命诗辞。清初刚烈的平阳妇最为突出:"平阳妇,不知其姓氏。顺治七年,姜瓖乱,为其徒所掠,过定州唐城村,刺血题诗于壁,并为序自述,略言:'明月在天,清水在旁。得自尽于此,上不媿父母,次不惭婿,庶几与水同清,与月同明。'遂自经死"。(14114)《柳絮集》录此《唐城村题壁》七绝一首:"血泪春山染碧纱,哭声直入河东家。楼前记得孤身死,愿作来生并蒂花"②,表达自己在兵乱中的孤立无助。黄婉梨也是如此:同治四年,清兵收复江宁,"有兵入其室,杀其母及其兄弟,缚婉梨置舟中,谓将归湖南。婉梨好语兵:'至汝家,当妻汝,舟中毋相逼。'时有金眉姑者,亦被掠,自沉于江,婉梨举以怵兵,兵不敢犯。月馀,将至其家,驱就陆,兵遇其侣,与俱投逆旅,二人方共饮,婉梨见牖上有毒鼠药,潜置食中。夜分,一人毒发死,一人毒浅,未即死,婉梨掣所佩刀剸其腹,题诗壁间,述始末,自经死"(14135)。戴可恒妻朱氏则死于洪秀全太平军攻城事:咸丰十年,杭州被攻破,朱父熙殉城,"朱具衣衾,视敛如

---

① 黄秩模编、付琼校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卷三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94 页。

② 据《柳絮集》引彭禹峰记,乃"炭书四绝"。见黄秩模编、付琼校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卷五十,第 2344 页。

礼,从可恒转徙。明年,复还,贼复至。围急,朱方为诗词自若,曰:‘我自为计久矣,何惧!’城破,朱语可恒速将子出避,赋诗矢死。不食两日,未绝;自经,缅断,又未绝;夜入池死,即熙死节处”。(14128)还有程季玉:“师克苏州,季玉与其父相失,就邻媪匿桃花坞。其女兄为部曲将所得,胁季玉去。季玉自经,不死,作绝命诗畀媪,使他日告其父,入井死。”(14136)还有为其他外力所胁迫,而为夫守节,作绝命诗者。张翼妻戴礼:“翼父韬,尝知休宁县,托翼于其友王毅,毅以女妻焉。韬卒,毅女亦死,继室于戴。毅子觊翼产,康熙六十年五月,诱至其家,迫作券,殴之垂毙,挤堕水。舁归,不能语,瞠视戴。戴泣曰:‘我一弱女子,不能为君复仇,当以死从君。’啮指以誓。越七日,翼死;又十七日,戴自经,衣带间得绝命诗三章。”(14146)窦鸿妾郝湘娥:“有绳其才者,豪家谋夺之,不能。嗾盗诬鸿死,湘娥因自经。将死,为绝命词,矢为厉以报。”(14147)

二是未受到任何外力胁持,在和平情境中,牺牲个人性命以报夫死,作绝命诗辞。张廷桂妻章孔荣既有绝命诗,又有临终书信:“廷桂贫,恒出客游,卒于抚宁。丧归,章为营葬。既窆,将自投穴中,为家人所持……廷桂尝入赀牒授主簿,或购其牒,章曰:‘吾以贫鬻牒,罔国家,罪也,况夫名,其可二耶?’遂焚其牒。既终丧,复自经。家人觉,解之。次日既夕,赴水死。死时为绝命辞数章,词旨哀恻,其卒章曰:‘忆往事兮,双泪沾巾。想当年兮,妾病沉昏。感君爱兮,信誓殷勤。云妾殁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岂偷存!痛万里兮,生会无因。轻一命兮,地下从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觅天涯兮,不惜艰辛。得伴君兮,死亦欢欣。十七年兮,夫妇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贫!中路诀兮,命蹇时屯。丧葬毕兮,不死何云?伤幼女兮,失母谁亲!死为君兮,此外奚论?’”(14159、14160)满族伊嵩阿妻希光死前题诗于壁:“伊嵩阿为大学士永贵从子,早卒。方病时,希光割股进,终不起,许以死……为伊嵩阿弟娶,嫁女妹及二女,次女行之明日,自缢死。张遗诗于壁,略谓:‘十载要盟,此日当报命。’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事也。永贵疏闻,高宗为赋诗,旌其节。”(14159)王如义妻向氏有《绝命诗》十首并自序:“道光十六年,如义暴卒,姑喻之嫁,矢以死。舅病,为刲股。家益贫,将强遣之,二十三年三月戊申,自沉荷花滩死。将死,为绝命诗十首,其序曰:‘妾涪陵向氏女,适王氏,未一年,而夫即世。昨岁翁又不幸。孤苦茕独,人劝以非礼,衣食事小,名节事大,惟一死以明志。夜题诗十首,藏笥中,他日阅妾诗,毋累阿姑也!’及入水,粘一纸桥柱,书五字,曰‘名节江中见’,死时年二十五。”(14162)这些列女以死殉夫,以绝命诗辞表达对丈夫的情感。

三是临终赋诗留辞,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抒发自己的生命意志。与殉夫守贞的列女不同,她们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诗歌自抒慨叹。程鼎调妻汪嫈“病将卒,为诗曰:‘秋风一叶落,余亦归荒墟。’遗书戒其子葆,言家事至详。复谓:‘武侯著书,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武侯第一流人,务一,而戒恐惧居其三,可不识所致力耶!’”(14054)遗书教子是汪嫈的德行体现,而其病卒前所作诗歌,以落叶象征自己即将陨落的生命,那种凄凉、无奈之情,令人嘘唏不已。唐之坦妻曹氏临终前作黄梅花诗,表达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并自喻己之操守:“康熙十五年秋,之坦卒,曹矢死,治衣衾必有副。食砒,不死;屑钱吞之,又不死。既敛,复饮卤,吐下而解;乃不食二十二日,夜投舍傍池,家人出之,死矣,顷复苏。曹谓其舅、姑及母曰:‘大人爱我,乃苦我也!’于是复饮食,操作如常,织自制衣一称,婢乞馀布,不与。家人窃议曰;‘数尺布,尚惜之,宜不死矣!’及冬,黄梅方花,曹视而叹,为赋诗,美其不落,复不食。至岁除,出馀布缢之坦柩旁,乃死。”(14153)《柳絮集》载此《咏蜡梅》诗:“添得冰霜枝叶无,此花自与众花殊。共知秋菊贞心在,尚有黄梅抱树枯。”①

列女的绝命诗辞,往往被现代人视作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守节的表现,且只视作礼教的牺牲品。其实,很早就有女性把死亡,甚至为夫而死,看作纯粹个人的行为,视为个人意志的实

① 黄秩模编、付琼校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卷十六,第 697 页。

现,而反对世人以节烈看待她们。所以,这种不是一般意义上守节殉夫的绝命文字,更值得我们深思。康熙时,钱塘人林邦基妻曾如兰所作《绝命诗》即是如此:“邦基卒,曾立其兄子为后,葬舅姑毕,具牒上县请死,知县慰止之。后十日,题辞,吞金殉。”其所题之辞乃五言诗,其中两句曰:“‘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14163)以赴死为“归家”,可以看出其死亡态度,几乎与儒家所提倡的君子视死如归的品格相媲美;而明言“人休作烈看”,则反映出她把殉夫完全看作个人的事情,是她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持这种态度的,绝不止曾如兰一人,又如狄听妻王甥稠:“(道光)十九年七月,听卒官,八月,子骢殇,九月丁巳,王缢……将殉,作书告听诸同岁,略言:‘夫亡当即死,诸君俱言抚孤重,故未敢尔。孤又夭,复何言?念两世单传,不可无后,今已立后,可报舅、姑、夫子地下!’王尝抚从女,年十七,已许字,留金嘱遣嫁。又谕所后子,期明年以丧还葬,与前母三棺同穴,以殇祔。并令斥赀佽祖祠,成父志。书末题曰:‘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康熙间钱塘林邦基妻曾所为绝命诗也”。(14163)王甥稠的死是殉夫,但她临终前于遗书末题写曾如兰的绝命诗以自明心志,也不希望世人以节烈看待她。可见,仅仅以封建节烈衡量这些列女的绝命诗辞,甚至据而轻视之,恐怕低估了它们的价值。像戴可恒妻朱氏在围城将破、敌人将至之际“为诗词自若”,唐之坦妻曹氏死前赋诗赞美蜡梅,等等,恰可与明代列女钱塘张氏死前“盛服题绝命诗”①等观,那种庄严的仪式感,那种从容不迫,使列女的临终文学关怀获得生命的超越和升华。

问学与艺术:列女文学的综合素养

美国学者孙康宜在《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女性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一文,开篇论述明清女性文学昌盛原因时说:“据我近年来研究中西文学的心得,我认为有史以来最奇特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中国明清时代才女的大量涌现。在那段三四百年的期间中,就有三千多位女诗人出版过专集。至于没出版过专集、或将自己的诗文焚毁的才女更不知有多少了。对于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我已在其他报章杂志上从各方面来研讨——例如从典律(canon-formation),文体论,女性识字率,以及出版业的繁荣等观点来着手。但在本文中,我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是,把明清女诗人的空前繁荣置于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context)中做一新的诠释。”②孙康宜先生所分析的明清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也完全适用于清代列女文学创作。但我们要补充的是:列女而有文学,显然比一般女性文学更为偶然,更为难得,故清代列女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其条件更为苛刻,女性识字率的提升这个原因,显然不足以说明列女文学的繁荣。《清史稿·列女传》记载“读书通大义”“授子读经”“能读书”“读书通大义,教二妾章句”“粗解文字”,以及死后遗书者,还有一些,但这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所以,列女文学的繁荣,在我们看来,另有其他深层原因;而综合素养的提高,则是非常重要的内因。

清代列女的综合素养,在三个方面有所反映。

一、博通经传。女性精通经传者,放眼整个历史,本来人数就少;而清代通经传之列女,却不乏其人。清初田雯母亲张氏,“通《诗》、《春秋传》”,当里党将庆贺其七十大寿时,她先后引用《礼》、《春秋》、《公羊传》的何休注,谆谆告诫诸子,以证自己作为未亡人不宜庆生。(14020、14021)洪亮吉母蒋氏,在亮吉父去世后,亲授亮吉经书,读至《礼经》“夫者妇之天”而“苦绝良久”;里中师教授亮吉而不辨音训,“母为正其误”。(14025)“光绪间,济阳艾紫东妻徐,名桂馨,治音韵之学,有《切韵指南》四卷。”(14051)程树妻宋景卫,“通经义,好读先儒论学书,娣、侄皆从讲说。”未嫁而程树去世,她不但在程树母丧、大父丧及夫丧诸事上,以《礼》服丧,而且,“同县

① 张廷玉等:《明史·列女传三》第 25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762 页。

② 孙康宜:《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女性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陈氏女淑睿,未行而婿殇,有请婚者,遂自经。景卫为作诗,于《诗》共姜用刘向说,于《春秋》伯姬用何休说,旁采朱彝尊、汪琬、彭定求诸家言,申女子子未嫁守贞之义。贯穿赅洽,八百馀言,以破俗说,白己志”。(14094)还有王甥桐“幼承父苏教,通经史大义”。(14163)历代正史列女传中通经义者,《晋书》《魏书》《宋史》《元史》各一人,只有《明史》是五人,与清代相等。从这里也可看出,女性受教育程度愈来愈高的发展趋势。

二、晓习史学。清代列女颇有通史学者,如陈之遴妻徐灿“通书史”;曾懿“通书史”;赵棻“子曰桢,撰《二十四史日月考》,赵为之序,曰:‘刘羲叟撰《刘氏辑术》,迄于五季,书久佚,仅存《通鉴目录》。自宋迨明,六百馀年,未有续为之者。曰桢好史学,习算,考当时行用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自《史记》至《新唐书》、《旧唐书》,属草已一百馀卷,余亟欲睹其成,预为此序,俾写定冠诸简端。’”(14053、14054)显然也通史学。而清代列女的史学才华,主要集中在对《列女传》的补续、注释上。汉代刘向所编《列女传》,陈述列女事迹,是历代女性学习、效法的典范。但在清代以前,列女们主要是学习、阅读,当然包括仿效践行,其补续《列女传》者,仅明代丹阳姜士进妻蒋烈妇一人而已。

可能受乾嘉汉学及善于著书的时代风气影响,清代列女有多人补续、注释《列女传》。恽珠,“拟《列女传》为《兰闺宝箓》”(14026),六卷,分孝、贤、慈、烈、智、才六类,乃一部分类列女传记;郝懿行妻王照圆,“其所自为书有《列女传补注》八卷,序曰:‘《列女传补注》者,补曹大家注也。照圆六岁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读书。尝从燕间,顾照圆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传》十五卷,今其书亡,如能补为之注,是余所望于汝也。’照圆谨志之不敢忘……略依先师之诂,用达作者之意,凡所诠释,将以通其隐滞,取供吟讽”。(14051、14052)其后,又有汪远孙妻梁端校注《列女传》:“幼为祖玉绳所爱。元和顾之逵校刻《列女传》,玉绳为审定,端辄胪其同异,退而笔之,玉绳为之折衷。既归远孙,与参酌增损。端既卒,远孙为刻行。”(14052)而王照圆不但校注《列女传》,还校正《列仙传》二卷:“旧有赞,考以《隋书·经籍志》,知为晋郭元祖撰,复别出为一卷”。(14052)

三、精研自然科学与艺术。非常难得的是,清代还有一些文学列女精通自然科学。王贞仪是典型代表:“贞仪通天算之学,能测星象,旁及壬遁,且知医……撰《星象图释》二卷,《历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皆一卷,《象数窥馀》四卷,《女蒙拾诵》《沉疴呓语》,皆一卷。”(14051)王贞仪天文、算学、医学、星象占卜学,无不通晓,《清史稿·列女传》引钱仪吉《历算简存序》称:“贞仪有实学,不可没,班惠姬后一人而已”,并称“女子治历算盖至鲜”。曾懿也著有《医学篇》《女学篇》。

清代列女还有多方面的艺术才华。钱纶光妻陈书,“画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署画,号南楼老人”。其曾孙女钱与龄,“亦能画,题所居曰仰南楼”(14024);恽珠姑恽冰,“画尤工粉墨,映日有光”;恽珠,“亦能画”(14026);唐素“鬻画以赡父母”(14033);徐灿能画,“画得北宋法”(14050);张琦女纶英“尤工书,传(张)琦笔法,真书出入欧阳、颜、杨诸家,分书自北碑上溯晋、汉,遒丽沉厚”;缪嘉蕙“工书、善画。光绪中,召入宫供奉,为皇太后嘉赏,特赐三品服”。(14054)仁兴妻瓜尔佳氏,与缪嘉蕙同被召,“著有《超范室画范》”(14055);龙氏“善鼓琴,工画兰”(14055);左锡璇“工诗善画,书法尤精”(14081);姜桂“能诗善画,尝为《柏舟图》”(14095);吴宗爱“幼慧,九岁通音律,十馀岁即能诗,善写生,间作设色山水”(14119);马雄镇妾顾茎“能诗画”(14121);郝湘娥“能诗善弈,画兼工花草、士女”(14147)。书、画、琴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为列女进行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从事文学编纂与文学批评。清代列女还有多种文学才能,表现为编纂文集、校刻书籍,进行文学批评等。恽珠“撰定清女子诗,为《国朝女士正始集》。校刻(恽)寿平父日初遗书及李颙集,皆传世”。(14026)恽珠所纂,即流传甚广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选清代闺秀九百三十三人,一千七百馀首诗歌。张緼英“尝编次《国朝

列女诗录》”(14054)。冒树楷妻周氏,“父星诒,诸父星譼、星誉,并有文行,周刻其遗著”。(14080)

清代列女的文学批评,颇值得关注。王贞仪有《文选诗赋参评》十卷(14051),据书名,当是评论《文选》中诗赋作品,是《文选》中文学性最强的两种文体。李长霞“邃于《选》学,著《文选详校》八卷”(14051)。其《文选详校》,一名《校文选李注》,专校李善注《文选》。王照圆“尤喜言《诗》,著《葩经小记》,书未成。懿行撰《诗问》,谓与照圆相问答,条其馀义,别为《诗说》,皆采照圆说为多。光绪间,其孙联薇以书进,因误为照圆著云”(14052)。葩经,出自韩愈《进学解》:“《诗》正而葩。”则王照圆论《诗》之语成《葩经小记》,书虽未成,但《诗问》七卷本附有《葩经小记序》一篇;其与夫问答论诗,则成《诗说》。所谓“懿行撰《诗问》,谓与照圆相问答……因误为圆照著”云云,其实不确:既是夫妻相问答,且以《诗问》称名,则王照圆自是作者之一。陈裴之妻汪端,更是清代女性文学批评大家,“尝撰定明诗初、二集,上始开国,下逮遗民,都三十家,附录又七十人。自定凡例,以为:‘初集,犹主盟之晋、楚;二集,犹列国之宋、郑、鲁、卫;附录,犹附庸之邾、莒、杞、薛。’梁德绳称其宗尚清苍雅正,能扫前后七子门径。吴振棫称其论一代升降正变,元元本本,纵横莫当”(14053)。则汪端所选《明诗初集》、《明诗二集》,不只是明诗选本,实兼有以清苍雅正标准,梳理、衡量有明一代诗歌正变发展史之意。其所自作诗集《自然好学斋集》,评论诗人、诗史之作大量存在。

综合素养的提高,无疑为清代列女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质素。顾若璞的“为诗古文词,多言经世之学”①,宋景卫的以《诗》及诸家说入诗,张令仪的“为诗古文,端本殖学”②,还有诸多列女作品皆有的大量题画诗、咏史诗、怀古诗,以及史论诗、诗论诗,等等,皆有丰富的意蕴。

馀　论

清代列女的文学创作,在清代即引起不少评论家包括女性评论者的关注,他们在诗话、词话、笔记著作中,在别集评点中,多予以高度评价。仅从《清史稿·列女传》看,传记作者往往也在叙述中禁不住对传主文学创作发出评论、称赞。如评徐灿:“词尤工,陈维崧推为南宋后闺秀第一。”(14050)评王贞仪:“为诗文皆质实说事理,不为藻采。”(14051)评王照圆:“文辞高旷,得六朝人遗意。”(14051)评汪端:“长为诗,旨远而辞文。”称张綗英“兼为词,秀逸有王沂[孙](中)、张炎遗意。”(14054)论汪嫈:“好学,通儒家言,诗文皆雅正。”(14054)通过这些简短的评论文字,可以看出,清代列女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前人的高度认可和高度称赞。

清代列女的创作,是清代女性文学的缩影,与清代女性文学保持高度一致,首先呈现出家族化、地域化的倾向。自家族化言,阳湖张氏四女,綗英、𦈡英、纶英、纨英,皆有文学:这是姊妹。张英妻姚氏,有《含章阁诗》;女令仪,有《蠹窗集》:这是母女。钱纶光妻陈书,能诗善画,号南楼老人,有《复庵吟稿》三卷,《纺馀闲课》;曾孙女与龄,亦能画,号所居曰仰南楼,有《闺女拾诵》《仰南楼闻见集》:此为祖孙。恽冰有《题画诗稿》,恽珠有《红香馆诗词草》二卷:此为姑侄。左锡璇为袁懋绩继妻,曾懿乃袁懋绩子妇;嵩山为养易斋女史之子,则嵩山妻为养易斋女史儿媳:此二家为婆媳。自地域性言,阳湖一县,除张氏四女外,尚有恽冰、恽珠、左锡璇;而丁畹芬占籍武进,钱孟钿是武进人,与阳湖同。顾若璞是仁和人,汪端是钱塘人,阚玉是仁和人,戴可恒妻朱氏是仁和人,同地。徐灿是吴县人,宋景卫是长洲人,同地。这种家族、地域的一致性,确实反映出列女文学与整个清代女性文学的共性特征。其次,清代从事文学创作

① 张纨英:《餐风馆文集》卷二《国朝列女诗传四十七首·张令仪》,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1401页。

② 张纨英:《餐风馆文集》卷二《国朝列女诗传四十七首·张令仪》,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下册,第1716页。

的列女,呈现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关系。就纵向看,除了多数都会受到刘向《列女传》的教育、影响外,还前后构成师承关系,如道光时的王甥稠显然自觉接受康熙时曾如兰临终作诗的影响,宋景卫曾赋诗表彰同县明代陈氏女淑睿事迹;就横向看,列女之间也互有交往,如王贞仪死前托遗稿于蒯夫人,梁德绳高度评价汪端的明诗选,等等。这些纵横关系,加上家族、地域的影响,促使清代列女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

The Literary World Created by the Outstanding Women in the Qing Dynasty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Biographies of the Outstanding Women* in *the Draft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Peng Guoz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ed literary writings created by outstanding women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Biographies of Outstanding Women* (《列女传》)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More than sixty outstanding women were engaged in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was twice as much as the total works of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Among them, as many as thirty – five women had their own collected poetic or prose works, which was a sign of prosperity of literary creation by the outstanding wome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and the greatest valuable function of their writings lay in that it carried rich connotation of morality. The deathbed poems written by these outstanding women reflected their literary concern when they were dying. The improve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containing classics, historiography, art, natural scienc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formed the internal reas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outstanding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ir writings drew attention from their contemporary critics, and their literary achievements were directly commended and commented in the *Biographies of the Outstanding Women in the Draft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清史稿·列女传》).

Key words: Qing Dynasty, literary world created by the outstanding women, *Biographies of the Outstanding Women in the Draft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nthology of an author's poetic or prose works, connotation of morality, deathbed poem,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本栏责任编辑　郑　园)